

浇灌“新民主教育之花”:薛暮桥与临沂山东大学

崔华杰

摘要: 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经济学家的薛暮桥,在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中,其人生经历了从铁路工人到经济学一代宗师的身份转变。在山东工作期间,他投身于临沂山东大学的创建工作,发挥了亲历者、建设者、设计者的重要作用,耕耘养护了这朵“新民主教育之花”。在校执教期间,薛暮桥所整编出版的《思想方法与学习方法》一书,既是对他在临沂山东大学的一份教学总结,也是临沂山东大学对他本人的知识反哺。通过对薛暮桥不同角色身份的考察,可展现历史巨变下临沂山东大学的发展特点及其时代贡献,也可通过对薛暮桥教育遗产的考察,体悟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之路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必然。

关键词: 薛暮桥; 山东解放区; 临沂山东大学; 华东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4.05.016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薛暮桥亲身参与中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建设,不仅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代高级经济官员之一,还被奉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者”“市场经济拓荒者”。为此,学界对薛暮桥的相关研究可谓成果丰硕。范世涛与薛小和通过大量原始档案和书信、手稿,记录了薛暮桥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轨迹^①,徐建青、董志凯、赵学军整编了薛暮桥自1945年在山东解放区工作期间至1983年任职于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时期的58本笔记^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金融出版社共同推出的20卷本《薛暮桥文集》,展现了薛暮桥所经历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60年变迁史^③。然而,这些成果多立足于经济学领域,所探讨的也多为薛暮桥的经济活动、经济实践、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对于薛暮桥的教育活动少有述及,更遑论系统研究和专题考察。

实际上,薛暮桥于1943年进入山东革命根据地开展对敌经济工作的两年后,即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临沂所开办的山东大学^④,且在学校于1948年迁至潍县(今潍坊)办学之前,发挥了见证者、建设者与设计者的重要作用。我们的这份研究,旨在以薛暮桥为观察视窗,展现历史巨变下临沂山东大学的发展特点及其时代贡献,也藉以对薛暮桥教育遗产的考察,体悟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之路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必然。

一、“要我在这里工作多久,我就工作多久”

薛暮桥,原名与龄,又名雨霖、雨林,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礼社镇^⑤。1918年,14岁的薛暮桥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省三师)预科,在全校学生中年龄最小。可惜因家境困难,薛暮

作者简介: 崔华杰,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250100; huajiecu@sdu.edu.cn)。

① 范世涛、薛小和:《薛暮桥年谱(1904—1952)》,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

② 徐建青、董志凯、赵学军:《薛暮桥笔记选编(1945—198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③ 薛暮桥:《薛暮桥文集》,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

④ 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在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所创建的山东大学,因与南京国民政府在青岛开办的“国立山东大学”名称基本等同,而被俗称为“临沂山东大学”。1948年夏,因国共内战,临沂山东大学与华中建设大学(建校于1944年)迁址潍县,合并组建华东大学。1951年春,经教育部批准,华东大学复迁青岛,并入国立山东大学,由此融入一体多源的山东大学百廿校史。

⑤ 薛暮桥在1933年之前,其党组织关系用名“雨霖”,后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入狱,出狱后以“雨林”自称。1933年1月,经陈翰笙先生推荐,以“薛暮桥”之名到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担任农村经济教员,自此便以暮桥为名。

桥入学两年后便从学校肄业,并以“薛雨霖”之名投考沪杭甬铁路练习生,以早日踏入社会来补贴家用。在顺利通过考试后,薛暮桥被录用到杭州车站,先是学习会计、电报收发等业务,后转为正式职工,担任车站的代理会计。新龙华火车站、笕桥火车站两站站长的岗位锻炼,既为薛暮桥参加和领导铁路工人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也使得薛暮桥意识到经济乃国家发展之命脉。

1927年2月下旬,薛暮桥与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也是中共党员的陈志一在杭州西湖会面。此时国共尚在合作之中,北伐军正在华北和华东开疆拓土。陈志一向薛暮桥征询是否意向加入国民党,遭到薛暮桥断然拒绝,其理由是:“国民党好像是火车开到嘉兴,就不走了,而共产党一直到上海。”^①薛暮桥用自己统管的火车运行为例,实际上是在表达只有共产党的革命才算彻底。看到薛暮桥意志坚决且志向高远,陈志一随即带着薛暮桥于3月1日去往中共杭州地委,与地委书记庄文恭、宣传部长华林和组织部长徐雪寒会谈。会上,中共杭州地委接受了薛暮桥的入党申请,并批准薛暮桥(时名薛雨霖)加入中国共产党^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薛暮桥利用自己工作的便利,帮助基层组织、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秘密转移。5月27日,薛暮桥在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召开会议时被捕,后转押到杭州的浙江陆军监狱五号,在这里一待就是三年半。在此期间,薛暮桥自学历史、英语、语言学等方面的知识,但读得最多的是西方和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为他后来成长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知识基础。

1930年12月,薛暮桥保释出狱,随兄长鹤龄返回无锡礼社。接着,经过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编辑、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调查员、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经济学教员的工作锤炼,薛暮桥形成了社会调查与理论结合的学术路向。全面抗战爆发后,薛暮桥在上海、南昌、长沙、武汉等地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并在1939年起在新四军任职,先后担任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处长、政治部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主任、抗大五分校训练部部长、抗大华中总分校政治部主任兼训练部部长等职。

1943年1月,受时任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委派,薛暮桥与新四军驻地各学校、机关抽调的50余名知识分子由苏北奔赴延安。薛暮桥这样回忆:“这因为我是中央来电指名抽调的,又是懂得一点军事知识的文人。”^③队伍行至山东地界后,一分为二,南路经微山湖行进,北路则从泰山进发^④。当时,新四军和八路军以陇海铁路为界,分南北区域由新四军和八路军各自驻防。

2月下旬,在山东八路军的迎接下,薛暮桥所带领的北路分队行至八路军115师驻地歇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前来看望,薛暮桥在谈话间应下“暂留山东工作三个月”的邀请,帮助解决货币斗争、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诸问题。此后,薛暮桥担任中共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和山东工商局监委,利用货币、贸易、生产“三位一体”斗争方法开展工作。

1943年冬,三个月的期限早过,“中央也有电报来催”。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罗荣桓一面复电中央陈述山东根据地工作所需,以作“缓兵之计”,一面瞅机会做薛暮桥的思想工作,以情感留人。薛暮桥这样回忆道,罗荣桓邀请他前往住所下围棋,说:“这一年你在山东工作成绩很大”,“山东的经济工作还需要你呀!”盛情难却,薛暮桥慨然表态:“一切由山东分局决定,要我在这里工作多久,我就工作多久。”^⑤这样,薛暮桥就正式留在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经济工作。而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则成为薛暮桥学术生涯的一个重大转变,即从理论研究转向实际的经济领导工作。

抗战胜利后,为提高行政效率,更是为了巩固解放区政权,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旋即改组为山东

① 薛暮桥:《薛暮桥文集》第20卷,第19—20页。

②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③ 薛暮桥:《薛暮桥文集》第20卷,第122页。

④ 参见周朝阳:《深入调查实际 潜心农业经济——姜君辰传略》,载《经济日报》主编:《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5页。此处文献提及沈其震、姜君辰两人与薛暮桥同为领队。

⑤ 薛暮桥:《薛暮桥文集》第20卷,第125—126页。

省人民政府,下辖5厅、4局、4市(青岛、济南、烟台、威海)以及5个行政主任公署,黎玉任政府主席,薛暮桥任实业厅厅长,杨希文任教育厅厅长^①。1945年8月22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山东大学,聘李澄之任校长、田佩之任副校长、仲星帆任秘书长,并设立山东大学管理委员会,薛暮桥与黎玉、李澄之、田佩之、杨希文、陈沂、孙陶林、仲焕章、张凌青、刘导生、白备五、张立吾等12人任委员^②。国民政府此前在青岛创办国立山东大学且扬名国内外教育界,因此时人多将中共所办之同名高校加举办地即临沂山东大学以作区别。薛暮桥与山东大学的学缘关系,由此揭开了历史序幕。

二、“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之抉择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在未来如何建设国家问题上,实际上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在教育领域的表现亦是如此。中共之所以组建山东大学,除了培养革命建设所需人才外,主要还在于争夺山东地区的高等教育权,并以“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映射和反对“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按照性质大致分为公立大学(主要是国立和省立)、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在抗战爆发前山东省内仅有两所本科大学,分别为坐落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与驻扎济南的教会所属齐鲁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疏散到四川成都办学,并于1945年10月回迁济南顺利复校。而国立山东大学则在1938年春转迁四川万县后“暂行停办”,流散在外的师友在抗战胜利后强烈要求尽快将学校复校,然而国民政府忙于“劫收”和准备内战,对于这一呼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③。因此,在国立山东大学于1946年春在青岛复校前,中共在山东地区组建最高学府,并命名为山东大学,事实上隐含着对山东地区高等教育权的争夺。

当然,如何做到名实相符,并与一所已有四十余年办学历史的同名高校开展学术竞争并招徕优秀青年,不仅事涉两所高校的发展,更是对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未来映征。正如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在临沂山东大学开校讲话时所指出的:“今天摆在青年人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是走向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去,一是向解放区来。”^④

1946年1月5日,经近半年时间的准备,山东大学在临沂举行开学典礼,新四军军长陈毅、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时任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长的薛暮桥等30余名来宾与会。到会学生除了山大本部及附中的学生,尚有山大代办之合作训练班、邮政学校、财经队、文化队的各类学员,约650余人。学校设在临沂经文学学校旧址,除招收预科学生外,尚有临时举办的合作、会计、文化、邮政四类训练班,其中合作训练班由山东省实业厅请薛暮桥妻子罗琼主持和开办。师资方面,作为经济学家的薛暮桥与自然科学家孙克定、历史与社会科学家刘力行、国际问题专家钱俊瑞、文学家张凌青、教育家杨希文等一道担任教授。

虽然名义上冠以大学之名,但临沂山东大学实际上存在多种问题。首先,该校在性质上仍然类属“军政大学”,即通过开设会计、文化、邮政等训练班,旨在培养军事和政工人才。其次,缺少合适生源。当时山东省的教育发展很不平衡,公立高中的数量极少,多数高中或是教会学校或是私塾性质,旧式教育占据优势。为此,临沂山东大学在开办之初,主要招收预科,以为本科阶段培养生源。最后,软硬件设施往往因陋就简,缺少系统规划。临沂山东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① 《山东省政府正式成立 黎玉任省主席》,《大众日报》1945年8月16日,第1版。

② 辛玮、尹平符、王兆良等主编:《山东解放区大事记》,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1—232页。

③ 参见山东大学编:《走进山大》,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33页。

④ 《山东大学开学》,《晋察冀日报》1946年1月23日,第1版。

的王海这样回忆当初到校报到时的第一印象:“这里没有幽静的校园、像样的教室,更没有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荒园,几栋破屋。”^①授课的教师多是山东省政府和军区的主要领导,如薛暮桥为省政府秘书长、钱俊瑞为新四军军部政治部宣传部长、张凌青为省文协会长、杨希文为省教育厅厅长。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授课,难以保证学校的正常教研运营。

此时,如何办好中共的山东大学,既实现大学之实,又彰显方向光明与道路正确,这一问题摆在了薛暮桥等人的面前。

其一,解决生源问题,完成大学的层次教育建设。1946年4月初,山东省政府商请苏皖边区政府给予师资支援。经华中局决定,将其所辖华中建设大学一批干部、教师和学生并入临沂山东大学。4月5日,华中局宣传部长兼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彭康带领400余名师生从淮阴迁来与临沂山东大学合并,仍称为山东大学^②。此时,全校师生人数约1600人,内有学生1410人。有了合适且充足的生源,学校分为专科、预科、本科授课,其中本科生726人、预科生362人、专科生322人^③。

其二,整合资源,完善系科建制。华中建设大学部分师生并入临沂山东大学之后,山东省政府根据临沂山东大学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变动情况,吸收华中建设大学彭康、朱达章两人,与黎玉、李澄之、薛暮桥等一起组建12人的委员会。在健全学校领导架构基础上,临沂山东大学根据当时任务所需,更结合师资人员的学科素养,对系科建制予以完善。此时,学校共设政治、经济、教育、文艺四系和数学、历史两个教学组。经济系的正副主任分别由薛暮桥和陈智方(后于1949年5月参与接管上海)担任,下设农林、合作、会计三科,另设立合作专修科,由罗琼任主任,在鲁中沂水县授课^④。实际上,考虑到临沂山东大学后来汇入山东大学学脉,加之国立山东大学从未开设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学科^⑤,因此,今日山东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建系历史当从此时溯源,薛暮桥也自然成为山东大学经济学科历史上的首任系主任。

其三,改革教学内容,以实践引领实学实用。临沂山东大学既系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也根据山东解放区的工作所需进行知识传授,呈现理论联系实际、政治教育和专业教育并重的教学特色。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克服过去学生的流动现象与教育工作中的游击主义,另一方面更是要预防正规化教育中的形式主义,力争做到学有所用。在这样的知识体系之下,既能培养革命青年,更能造就解放区所需的各类建设人才。

如何做到学有所用?可以薛暮桥所主持的经济系为例。经济系下设农林、合作、会计三科,所开设课程既有政治经济学等宏观性理论课程,又有中国农村经济、解放区经济政策等紧密联系工作实际的应用性课程。这些系科设置和所讲授的内容,既是革命形势所需,也是系主任薛暮桥根据自己过往实践经验而勾绘的学科蓝图。早在1932年,薛暮桥就跟随陈翰笙进行无锡等地的农村经济调查,并发表处女作《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认识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⑥。在江苏省民众教育馆研究委员会工作期间,薛暮桥又注意到合作社在民众教育与动员中的关键作用^⑦。薛暮桥于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执教时,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对广西6个专区90多个县进行撒网式社会调查,并与刘端生

① 王海:《王海上将:我的战斗生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② 辛玮、尹平符、王兆良等主编:《山东解放区大事记》,第252页。

③ 《山东大学简史》编委会编:《山东大学简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48—149页。

④ 山东大学档案馆编:《山东大学大事记(1901—1990)》,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4—315页。

⑤ 1930年省立山东大学利用私立青岛大学校舍改称国立青岛大学,所设学院有文学院、理学院和教育学院。1932年,学校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相继增设工学院、农学院。时至新中国成立,国立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并组建新山东大学,下设文理工农医5院和政治与艺术两个直属系,方才设置社会专业。

⑥ 参见范世涛:《陈翰笙与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5期。

⑦ 参见雨林:《农村经济调查杂谈》,《教育新路》1932年第12期。

合作出版《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一书^①。1934年夏到1938年10月,薛暮桥专职负责由陈翰笙担任主席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日常管理工作,在学术争辩中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底复杂的经济结构”,以及直接间接支配着中国农民的整个经济体系^②。可以说,薛暮桥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学术研究,既有理论架构上的学理探索,也有将之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鲜明特色。这种创造性的结合,不仅是薛暮桥经济研究特色之自然演进的结果,也是山东解放区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所需。

其四,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彰显道路优势。在临沂山东大学成立之前,山东地区甚至全中国学校的教学内容与课程设置多沿袭国外或承袭封建教育遗风,女性缺乏教育权,所学非所用导致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相当普遍。总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教育占据统治地位。

临沂山东大学如何践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呢?可以说从招录到送出都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方针,即“要把青年培养成许多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人材,去为人民大众服务”^③。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学校施行供给制,体现制度的优越性。学生一律免收学杂费,饭食文具全部由学校供给,被服用品亦根据一般需要随时予以补充。这表面上是为了解决贫苦子弟的就学困难,但主要是为了让这些同学及其家人不仅从政治与经济上翻身,还要从文化和教育上翻身。当然,更是为了培养群众的先锋,使他们成为发动群众,组织领导群众的骨干。

二是招生对象面向所有群众,并实现男女教育机会均等。1946年《大众日报》记者调查了临沂山东大学的学籍情况,发现学生除了来自山东本省外,还有来自东北、河北、浙江、山西、重庆、南京、上海等“十五六省及各大都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出身于地主、中小资本家及小市民之家”^④。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空军司令员的王海,有后来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芮杏文,有后来参演《李双双》《北国江南》《白求恩大夫》《巴山夜雨》等电影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仲星火,也有唯一一个从20世纪50年代跨到80年代的女性导演董克娜。

三是既立足当下,为山东解放区培养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创造者与建设者,更放眼未来,为新中国培养各方面的建设干部。1946年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当时解放区千人左右大学共计四所,分别是张家口之华北大学、邢台之北方大学、临沂之山东大学和淮阴之华中建设大学。其中,华中建设大学有1300人,临沂山东大学有800人,是在校人数排名前二的高校,而两校又于1948年迁至潍县合并组建华东大学。诚如临沂山东大学教育系主任杨希文所言,“我们的大学办在山东解放区3000万人民中间,办在中国,办在整个世界上”^⑤。临沂山东大学的建设不仅是为了当时改造旧中国的事业,也是为了未来建设新中国事业的需要,不仅是为山东解放区、华东地区乃至全国培养建设人才,还要把建设新型人民大学的各种经验推广到全国,成为建设新中国大学教育的中坚。因此,《新华日报》将临沂山东大学等上述解放区四所大学并誉为“新民主教育之花”^⑥,还指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名流学者执教”,并将“经济学家薛暮桥”与“国际问题专家钱俊瑞”作为临沂山东大学的师资代表。新民主教育之花的盛开,显然是园丁劳动的结果,而作为经济学家的薛暮桥自然也是辛勤耕耘的园丁之一。

① 薛暮桥:《薛暮桥文集》第20卷,第42、44页。

② 薛暮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见《薛暮桥文集》第1卷,第118—127页。

③ 梁唐晋:《省立山东大学举行隆重开学典礼 省府黎主席亲临讲话》,《大众日报》1946年1月11日,第1版。

④ 伊兵:《记临沂山东大学》,《大众日报》1946年5月23日,第4版。

⑤ 《炮火中诞生的院校——山东大学旧址巡礼》,见中共临沂市委党史委编:《历史的丰碑:沂蒙百处革命纪念地巡礼》,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36页。

⑥ 《新民主教育之花:解放区四大学》,《新华日报》(华中版)1946年2月28日,第2版。

三、是“文化战士”,也是“青年导师”

在临沂山东大学执教期间,时局相对稳定,薛暮桥也有了闲余时间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的著述工作。1946年2月,薛暮桥主编出版《论新民主主义经济》,收录了毛泽东、周恩来所写的四篇文章以及其本人所撰写的《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农业发展的新方向》《农业生产建设问题》《怎样办合作社》四篇文章,主要是“为了帮助同志学习经济工作”,因为“我们不但要建设农村,而且要建设城市,不但要发展近代化的农业,而且要发展大规模的农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①该书于1946年3月经坐落在临沂的山东新华书店出版之后,广受欢迎,被奉为“开有益之卷”^②,也被列为“乙级干部学习书目之一”^③。

当然,在临沂山东大学执教期间,薛暮桥更负盛名的著作则是《思想方法与学习方法》一书^④。该书也是经山东新华书店于1947年1月出版,篇幅不长,主要包括“人为什么犯错误”“怎样认识客观世界”“理论与实践”“立场和方法”与“我们的学习方法”五章节内容^⑤。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本哲学著作,但实际上是薛暮桥“从事经济工作和研究经济科学的方法论早期的总结”^⑥。该书出版之后,亦被多地出版机构重印,直到1949年9月还被作为初级中学课本由人民出版社在全国出版发行。根据薛暮桥后来的回忆,当时之所以要出版这本书,除了政治形势所需之外,在临沂山东大学的工作经历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动因。

实际上早在1942年,薛暮桥就有了撰写该书的动机。薛暮桥当时担任抗大华中总分校(原抗大五分校)政治部主任兼训练部部长,在学习贯彻延安整风运动精神时,系统学习了毛泽东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实践论》和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党校讲的《人为什么犯错误》等经典文献,学思践悟,写下很多学习笔记,这打下了《思想方法与学习方法》一书的文本框架。1943年薛暮桥来到山东工作,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后面临广大革命干部缺乏工作方法的困境,便有了将抗大华中总分校学习笔记加以整编的历史机遇。

1946年1月临沂山东大学兴办后,作为经济系主任的薛暮桥“常常抽空去讲课”。在当年春吸收华中建设大学师生之前,临沂山东大学所开设的高等教育层次只是预科,实际上属于培训班性质,其主要任务是给入学的革命青年以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使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初步奠定革命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大部分教师主要开设的课程,或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史,或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组织的基本原则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或是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动力、进程等知识。

面对五湖四海的青年学生(也是党的预备干部),薛暮桥另辟蹊径,既没有讲中国革命问题,也没有讲政治经济学,而是讲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问题。这恰好契合了校方关于改革学风的要求。校方引导教师在授课时坚持理论与实践一致,在教学方法上要提倡启发自由研讨、民主争论,以达到批判地接受学习,而学生要秉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学习精神,要敢于大胆怀疑与自由争辩。这样的教学方式及其效果,用教育系主任杨希文的话来说,就是“打开大门,学习实际,学用一致,实事求是,不

① 薛暮桥编著:《论新民主主义经济》,临沂:山东新华书店,1946年,第3页。

② 《怎样去“开”有益之“卷”》,《东北日报》1946年9月30日。

③ 《新书推荐:薛暮桥著〈政治经济学〉》,《新华日报》1949年4月11日。

④ 薛暮桥:《思想方法与学习方法》,临沂:山东新华书店,1947年。

⑤ 1949年经天津知识书店再版时,根据时势发展又增加第六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⑥ 薛暮桥:《我的经济观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见薛暮桥著:《薛暮桥晚年文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5页。

尚空谈”，朱达章教授则更是生动地形容为“教授教学生，学生教学生，学生教教授”^①。

在这样的教学相长的良好氛围之下，薛暮桥将其抗大华中总分校学习笔记进行整理，并根据课堂上的知识反馈加以补充，先是在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的《山东文化月刊》上发表，后来又将其整编成册，用作临沂山东大学授课教材，并经山东新华书店刊行。可以说，《思想方法与学习方法》一书，既是薛暮桥在临沂山东大学的一份教学总结，也是临沂山东大学所营造的校园文化对薛暮桥本人的知识反哺。

据薛暮桥回忆，《思想方法与学习方法》一书发行之时，正值解放战争日益扩大、蓬勃发展，“大家注意力集中在战争上”，这本书在国内因而没有受到多大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在与来访的日共代表团交流时，薛暮桥方才得知日本共产党曾把该书翻译成日文，当作党员学习的课本，其发行数要比中国国内大得多^②。因为该书类属教材性质，主要是做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不属于经济范围，因而并没有收录到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薛暮桥学术精华录》一书。在1996年撰稿《薛暮桥回忆录》时，薛暮桥“特意把那本书找来重读一下，觉得此书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可能还有些用”^③。实际上，对青年的思想教育何止“可能还有些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大众》曾发表的一篇记者采风，这样描述了薛暮桥的外观：“他的性情很温柔，眉目清秀，瘦弱又多病——这是他的工作最大损失……”；但同时指出，若从薛暮桥的实际工作经历来看，他既是一名“文化战士”，也是一名“青年导师”^④。可以说，如同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一样，薛暮桥通过《思想方法与学习方法》一书，对解放战争时期的青年革命参加者甚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都发挥了思想引导、价值塑造的重要作用。薛暮桥留给山东大学的文化遗产，在当下仍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意蕴。

四、余论

1947年9月，中央来电要求薛暮桥代表华东局转到华北财经办事处任副主任^⑤。罗琼也接到中央组织部调令，到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适时解放区连成一片，妇女工作需要连片开展，因而也要增加领导干部从事组织工作。1947年10月中旬，薛暮桥携罗琼、薛小沂与南汉宸、孙揆一、高星华、尹伯兮等乘车从山东渤海区出发，经河北南部平原前往平山县西柏坡^⑥。从此，薛暮桥告别了他工作四年的山东解放区，也告别了他耕耘两年多时间的临沂山东大学。

对于1943至1947年在山东地区的工作，薛暮桥这样总结说：“在这一时期经济工作实践中，我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货币、物价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⑦在“经济工作实践中”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这既是薛暮桥对山东解放区工作的心得体会与经验总结，也是其一生经济学研究的身份符号和学术风范。而对于山东大学来说，薛暮桥所形塑的思想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研取向，亦奠定了今日山东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特色与研究风格。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下，山东大学的人文社科研究者能够也应该立足中国现实，建构起能破解“中国问题”的原创性“中国理论”，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与时代之问。

① 参见伊兵：《记临沂山东大学》，《大众日报》1946年5月23日，第4版。

② 薛暮桥：《薛暮桥文集》第20卷，第127页。

③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119页。

④ 叶成芳：《作家印象录——薛暮桥先生：是青年导师，是文化战士》，《青年大众》1939年第1卷第7—8合期。

⑤ 薛暮桥：《薛暮桥文集》第20卷，第142页。

⑥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135页。

⑦ 薛暮桥：《薛暮桥文集》第20卷，第136页。

Nurturing the “Flower of New Democratic Education”: Xue Muqiao and Linyi Shandong University

Cui Huajie

(School of Histor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Abstract: 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Marxist economists, Xue Muqia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lanned economy and market economy systems. He was not only hailed as on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enior economic official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also he was regarded as the “pioneer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pioneer of the market economy”. Although academic research on Xue Muqiao has been fruitful, these achievements are primarily based o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discussing Xue Muqiao’s economic activities, practices, thoughts, and theories as for hi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hey call for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thematic investigations.

This study outlines Xue Muqiao’s transformation from a railway worker to a master of economics, focusing on his involvement in establishing Linyi Shandong University during his work in the Shandong area from 1943 to 1947. We argue that Xue Muqiao played a crucial role as a witness, builder, and designer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Linyi Shandong University, cultivating and nurturing this “nurturing of new democratic education”.

During his tenure at Linyi Shandong University, Xue Muqiao compiled and published the book *Methods of Thought and Learning*. This work has served as a summary of his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and a reflection on his knowledge gained from the institution. The book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guiding and shaping the values of young revolutionary builders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and the early stages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is cultural heritage left by Xue Muqiao to Shandong University still holds its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oday.

Forming theoretical views through economic work is not only Xue Muqiao’s experience and summary of his work in the Shandong area but also his identity symbol and academic style in his lifelong economic research. By examining Xue Muqiao’s different roles and identities, we can showcase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Linyi Shandong University under tremendous historical changes.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Xue Muqiao’s educational heritage, we can understand the inherent logic and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Shandong University,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rientation proposed by Xue Muqiao, which emphasizes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research style of the economics discipline at the institution today.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at Shandong University should base themselves on the reality of China, construct original “Chinese theories” that can solve “Chinese problems”, and offer scientific answer of the questions of China, the world, the people, and the times.

Keywords: Xue Muqiao; Shandong liberation area; Linyi Shandong University; East China University; China higher education

[责任编辑:王玲强]